

[发表论文 1]

从韩国的角度看壬辰倭乱

崔永昌 (国立晋州博物馆)

[原文: 韩文 翻译: 花井美和(早稻田大学)]

壬辰倭乱始于 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 明军为了援助朝鲜参加战争, 该战争扩大到东亚三个国家的国际战争。七年间, 除了济州岛之外的朝鲜半岛几乎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此次战争深深铭刻在朝鲜后期和近现代韩国人的历史与记忆里, 也成为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和敌视日本的起点。^①

虽然 16 世纪末东亚三个国家在朝鲜半岛进行过激战, 但对于壬辰倭乱, 当时和现在的韩中日三国分别有着不同的记忆和理解。对这次战役三个国家分别使用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 (韩国)、文禄庆长之役 (日本)、抗倭援朝 (中国) 等不同名称^②。韩国称之为壬辰倭乱已经相当久了。朝鲜时代紧接着战争之后称之为‘壬辰之倭贼’、‘壬辰之乱’等等, 用了不同的名称, 但是没过多久, 广泛称之为壬辰倭乱。从此以后, 韩国称此战役为壬辰倭乱已有 400 多年, 这说明百姓看待战争的视角没有太大变化。^③

虽然有关壬辰倭乱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 但是基于近代殖民地经验的反日情绪和历史性、政治性目的等, 对韩国理解壬辰倭乱影响最大的还是“克服国难史观”。从一般国民或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层次上来看, 其影响力是绝对的。最近摆脱一国历史的观点, 虽然试图从东亚视角看壬辰倭乱的意见在逐渐增加, 但民族主义和国难克服史观的视角对壬辰倭乱的理解仍然根深蒂固。本研究将阐明从朝鲜后期到现代韩国对壬辰倭乱的记忆和理解, 并且分析其中的问题, 提出改进的方案。

1. 朝鲜后期对壬辰倭乱的认识

壬辰倭乱在精神和物质上对朝鲜造成了巨大损失。朝鲜政府在战争之前估计人口为(1000 万)、土地面积(500 万结), 战争之后人口减少了 7 分之 1 (150 万), 土地减少了 10 分之 1 (50 余万结)。^④受害者和被日本掳去的人员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对朝鲜王室打击最大的, 是日军占领首尔期间糟蹋朝鲜第九代王成宗和第 11 代王中宗的能人宣陵和靖陵的事件。因此, 壬辰倭乱期间产生了“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的认识, 该认识持续到旧韩末。

虽然关于壬辰倭乱的国难克服史观经历近代历史学的日帝强占期, 在 1950-70 年代确立, 但

^①이규배, 「조선시대 적대적 對日 인식에 관한 고찰-임진왜란-조선시대 말기를 중심으로」, 『군사』 84, 2012.

^② 『광해군일기』와 『선조수정실록』에 ‘壬辰倭亂’이란 용어가 처음 등장하는 것으로 보아, 『광해군일기』가 편찬된 인조(재위 1623-1649) 대부터 사용된 것으로 보인다.

^③오종록, 「여러 얼굴의 전쟁, 임진왜란」, 『내일을 여는 역사』 1, 2000.

^④강응천·한명기 외, 「인포그래픽으로 보는 임진왜란」, 『16 세기-성리학 유포피아』(‘민음 한국사’ 조선 02), 2014.

是从国难克服史观看壬辰倭乱的观点可回溯到朝鲜时代。壬辰倭乱时宣祖的庙号原本是宣宗，但是在1616年（光海君 8）晋升为宣祖。^①‘祖’代表着新的王朝的创始，说明高度评价拯救了王朝的宣祖。

（1）国家层面对壬辰倭乱的追悼和记忆

正如1604年（宣祖 37）的扈圣、宣武、清难、出现在功臣册封^②，朝鲜朝廷纪念壬辰倭乱并且推进了追认程序^③。对扈圣功臣86名，宣武功臣18名，清难功臣6名加以册封，在宣武功臣中树立战功的仅有14名，最重要的是比宣武功臣绝对多数的是扈圣功臣，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宣祖对壬辰倭乱的认识。^④

“如果没有中国军队的力量怎能赶出倭敌。重获国土的功都归于中国军队的功。我们国家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有多年防守的功劳。”^⑤

因为宣祖不承认朝鲜官军和义兵的功劳，所以起初的宣武功臣候选人是包括李舜臣的仅四人。宣祖认为在铲除壬辰倭乱时，明军的功劳是决定性的，随行自己到义州并且叫来明朝军队的臣下们的功劳最大。所以册封了扈从自己到义州的内侍，但是未册封郑仁弘、金沔、郭再祐、金千鎰、赵宪等义兵将帅，引起了很大争论。^⑥为了改变这种现象，1605年（宣祖 38）对在战争中立功的功臣和提供军需品的 9060 名宣武原宗功臣实行了禄勋措施。^⑦这时郑仁弘、金沔、郭再祐等人封为一等宣武原从功臣。

朝鲜王朝为了整顿立足于性理学伦理的统治体系，在壬辰倭乱之时发掘忠臣孝子、烈女的事迹进行表彰，同时为了告知天下，于1617年（光海君 9）汇编出版了《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以三国时代到朝鲜时代的人物为对象，一共记载了1587个忠臣、孝子、烈女的事迹例，其中壬辰倭乱时因日军受害的事迹超过三分之一的76件^⑧。壬辰倭乱的主要战场庆尚道和全罗道的事例较多，身份为两班和良民的占大多数。在朝鲜社会选定为忠臣、孝子和烈女是彰显家族地位和赢得认同的好机会。

在仁祖反正后也一直对壬辰倭乱进行着追认纪念活动。壬辰倭乱后第一周甲的 1652 年到第五周甲的 1892 年，每周甲都要祭拜在战争中殉节的将军、士兵和功臣，并对其子孙给予官职的同时，也为他们建了书院和宗祠。跟七百义冢一样，在壬辰倭乱时牺牲的军民，国家为此致祭^⑨，并且在东莱为了致祭，为在壬辰倭乱时以左水营军民身份战死的人建了义勇坛。特别是在纯祖、宪宗、哲宗等时期，表彰了壬辰倭乱时殉节而没得到承认的有功之人，把几乎所有的壬辰倭乱时的忠臣和烈士都加到追悼名单上。

与朝鲜后期对壬辰倭乱认识有关，值得注目的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对李舜臣评价的变化。

① 『광해군일기』 권106, 광해군 8년(1616) 8월 4일 임인.

② 『선조실록』 권175, 선조 37년(1604) 6월 25일 갑진.

③ 김강식, 「조선후기의 임진왜란 기억과 의미」, 『지역과 역사』 31, 2012.

④ 오종록, 「보통 장수에서 구국의 영웅으로-조선후기 이순신에 대한 평가」, 『내일을 여는 역사』 18, 2004.

⑤ 『선조실록』 권135, 선조 34년(1601) 3월 17일 을묘.

⑥ 『선조실록』 권 180, 선조 37년(1604) 10월 29일 을해.

⑦ 『선조실록』 권186, 선조 38년(1605) 4월 16일 경신.

⑧ 손승철,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를 통해 본 임진왜란의 기억」, 『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세계의 변동』, 경인문화사 2010.

⑨ 『영조실록』 권38, 영조 10년(1734) 6월 18일 임술.

李舜臣并非在19世纪末当国家处于民族危机之时才首次被视为英雄^①，而是在朝鲜时代已经受到英雄的待遇。当然，壬辰倭乱之时宣祖和朝廷对李舜臣的评价有所不同。宣武第一功臣李舜臣的对手元均也被一起册封，这一事实表现出当时的氛围。与宣祖对李舜臣的怀疑不一样的是，在他殉国之后不久以统营建立忠烈祠为开端，孝宗时重建了南海露梁庙（忠烈祠），肃宗时因区域儒生的邀请，在有着李舜臣墓的牙山上建立了祠（显忠祠）。先前在光海君时汇编了《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其中记载李舜臣在1643（仁祖21）年得到了忠武的谥号，并且从孝宗开始到正祖期仰慕程度达到了高峰。在孝宗代时编完《宣祖修正实录》后，李舜臣被评价为名副其实的‘壬辰倭乱最高战功者’。光海君、仁祖和孝宗如此纪念李舜臣都是有理由的。光海君有必要抵制后金的攻击，当时是仁祖已投降清朝之后的时期。当时孝宗为了报复丙子战争时受到的羞辱，正积极推进北伐计划。

肃宗时李舜臣的地位被称为‘先正’，身份升级到了最高地位——大臣。‘先正’意味着成了故人的正臣，此外宋时烈和宋俊吉是在当时被称为先正的代表性人物。在全罗道的古金岛建立的老爷庙，既在关羽祠里作为朝鲜将帅的代表李舜臣也被供奉，为此李舜臣成为了代表朝鲜，代表我们历史的武将^②。在壬辰倭乱中再评价与明朝军队一起守护朝鲜的中华文化的象征性人物李舜臣成了这时期的彰显事业的背景。^③

经过英祖对李舜臣的崇拜，到正祖之时达到了巅峰。正祖在1793年（正祖 17）7月下达了关于追赠李舜臣为领议政的书的同时，亲自修建了李舜臣的神道碑名^④，1795年汇编和发行了《李忠武公全书》。朝鲜时代以王的名义汇编关于大臣、武将文集的事例或者王亲自编大臣碑文的事例，此前是不存在的^⑤，可以看出得到国王认可的李舜臣，成为留名青史的英雄。

在文人领域称赞了宋时烈，在武将领域里称赞了李舜臣的正祖发行了《李忠武公全书》。此书象征着勿忘明朝神宗皇帝的恩惠和延续丙子胡乱之后朝鲜儒学者们建立的崇明排清的道义和名分，同时重新评价了李舜臣^⑥。因《李忠武公传书》的发行，对壬辰倭乱时朝鲜水军的积极表现只能主要通过他的日记或者报告文书的内容来解释。与此同时，对视为李舜臣对手的元均的评价经过英、正祖时期后是最糟糕的。随着李舜臣的地位逐渐上升和纪念追悼活动的进行，李舜臣的子孙德水李氏在朝鲜后期成为代表性的武班家族。更重要的是李舜臣的子孙们与后金的战争或者英祖时发生的李麟佐之乱时表现出的忠心，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忠臣家族出忠臣”，李舜臣成为象征性的角色。^⑦

当然，不止李舜臣，推动北伐的孝宗和宋时烈也把在东莱城战斗中殉节的西人系的宋象贤宣扬为节义的象征。此外，丁酉再乱当时由暗引安蔭县监坚守黄石山城与儿子一起殉节的郭浚、僧长洒溟堂惟政等人也被大力颂扬。

（2）地区社会和个别门中层面对壬辰倭乱的理解和记忆

^①오종록, 앞의 논문, 2004.

^②『숙종실록』 권49, 숙종 36년(1710) 12월 17일 정축.

^③이민웅, 『이순신 평전』, 책문, 2012, 417쪽.

^④『정조실록』 권38, 정조 17년(1793) 7월 21일 임자.

^⑤ 이태진, 「정조대왕의 충무공 이순신 숭모(崇慕)」, 『충무공 이순신과 한국 해양』 제2호, 해군사관학교 해양연구소, 2015.

^⑥정두희 「이순신에 대한 기억의 역사와 역사화-4백 년간 이어진 이순신 담론의 계보학」, 『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휴머니스트, 2007, 202-203쪽.

^⑦오종록, 앞의 논문, 2004, 161쪽.

朝鲜后期从国家层次开始呈现出记忆壬辰倭乱的努力，经过地区社会扩展到个别家族。在中央政治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岭南南人士族，他们试图制造义兵将的子孙的记忆，在地区社会构筑基础，进而为再次进入中央政治打下基础。

郭再佑防御火旺山城，过了137年后的1734年(英祖)刊行了名为《倡義錄》的书，在此1579年丁酉再乱时以‘一起吃苦进火旺山城的名单’理由收录到了「火旺入城同苦錄」。「火旺入城同苦錄」记录了一共699人的姓名、字、出生年月、号和居住地等，其中第一章只编排了19名防御使，他们是郭再佑军队中有具体任务的人物，剩下的680名没有具体任务的人物。收录了很多离昌宁的火旺山城很远的安东(115名)、庆州(63名)和首尔(55名)人的这一名单，实际上不是在守护火旺山城时写的^①。壬辰倭乱之后进行的彰显氛围中反映出为了与被称为岭南第一义兵将郭再佑跟自己的祖先形成联系的情形^②。主导出版『倡议录』的郭再佑的曾孙郭元甲和朴胤光是在1736年同岭南儒生4000名一起反对宋时烈和宋浚吉参与文庙从祀的人物，「火旺入城同苦錄」是为了对抗当时统治政局的老论，谋计岭南南人的团结，以朴胤光等岭南南人为主要人物而制造的，这一看法得到了重新评价。^③

壬辰倭乱时指挥庆尚右道义兵的金沔的『壬辰倡義時同苦錄』估计也是在19世纪汇编而成。『壬辰倡義時同苦錄』上记载的共有162人，大部分是与庆尚左道和右道义兵有关的人物。事实上，19世纪是岭南南人们无法进入中央政界的时期，于是，在乡村社会在这本书里留名的家族可以维持有力的地位。^④与此同时，如同1799年(正祖23)以生活在光州的高敬命的子孙为中心，为了赞颂先贤的业绩而汇编的『湖南節義錄』，1831年在晋州刊行的记录晋州城战斗参战者的『忠烈錄』，在地区层次形成了整理壬辰倭乱的事业。『湖南節義錄』收录了在壬辰倭乱和李适之乱、丁卯、丙子胡乱、李麟佐之乱的战争中立功的湖南出身的1457名人的小传，其中946名是与壬辰倭乱有关的人物。尽管从准确性和客观性角度看是有很多局限的资料，但是朝鲜后期对湖南土族们而言，为了让壬辰倭乱时的祖先得到认可，所以尽可能让其载入史册。^⑤

壬辰倭乱之后对壬辰倭乱当中没有得到记录的个人或者门中们在国家的壬辰倭乱彰显氛围中汇编了实記，试图恢复对先代的记录。较早时期1785年，以庆尚右道义兵将金沔的『松菴實記』为开端，刊行了对壬辰倭乱兵长的实記和遗稿，在壬辰倭乱义兵运动中没有浮现突出功绩的庆尚左道地区刊行了很多的实記是一个特征。而且这些实記上登载了与「同苦录」相似只罗列人名的各种「会盟录」。它是通过记录没有以义兵实际参与战斗的祖先，使其成为历史事实的政治上努力的产物，也是通过它建造乡村社会基础的行为。^⑥

(3) 从历史小说《壬辰录》看朝鲜后期民众对壬辰倭乱的理解

壬辰倭乱结束后，刊登了反映民众们对前所未有的的战乱的认识的历史小说『壬辰录』。在丙子胡乱(1636)之后17世纪中期最早期版本刊登后，到现在为止出版了用韩文或者汉文写的70多种不同的版本。^⑦通过壬辰倭乱传承的排倭的战争传说，经过长期的口传过程，以文字形式

^① 하영휘, 「화왕산성의 기억-신화가 된 의병사의 재조명」, 『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휴머니스트, 2007, 122-125쪽.

^② 김강식, 「조선후기의 임진왜란 기억과 의미」, 『지역과 역사』 31, 2012, 27쪽.

^③ 하영휘, 앞의 논문, 126-17쪽.

^④ 정진영, 「松菴 金沔의 임란 의병활동과 관련 자료의 검토」, 『대구사학』 78, 2005.

^⑤ 김강식, 앞의 논문, 35쪽.

^⑥ 김강식, 위의 논문, 29-33쪽.

^⑦ 소재영·재영남, 『임진왜란사료총서(문학)』 1, 해제 참조, 국립진주박물관, 2000. 존 B. 던컨은

广泛扎根后，又经过重新抄写和重编，出现了各种异本。不仅有符合历史事实的版本，也有充满虚构的版本。

最具代表性的版本是国立中央图书馆（汉文版），它是由虚构人物崔日景的诞生开始到壬辰倭乱爆发以及战争的经过和战争结束后的情况等多样的传说似的故事构成。在各种版本中都出现了泗溟堂让日本国投降的故事，金应瑞、姜弘立征伐日本的故事，关云长暗助朝鲜军的故事等。消极描述朝鲜王和大臣们也是其特征之一。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李如松因试图切断朝鲜山川之脉而受到太白山山神的斥责或遭受死亡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排斥日本和明朝的朝鲜民众的对外感情。

在『壬辰錄』登场的主要人物有李舜臣、郭再祐、金德齡、鄭文孚、趙憲、靈圭、金应瑞、論介、桂月香等。进行对韩国将帅英雄化的事业及对日本和中国持有敌对感情的表露等为特征的『壬辰錄』，通过对壬辰倭乱的记忆确认了朝鲜后期在民间形成的具有排斥性的民族一体感。^①日帝强占时期『壬辰錄』视为禁書，朝鲜总督府禁止出版。『壬辰錄』也成为以英雄主义和一国主义视角审视这段历史的起点。^②

2. 日帝强占时期对壬辰倭乱的认识

19世纪末日本再次入侵朝鲜，以统治阶级为中心定性壬辰倭乱为国民整体团结的龟鉴。在陷入日帝殖民地的危机中，壬辰倭乱被视为克服国难史的主题，之后作为统治层与被统治层即全‘民族’无区别地一起团结来克服国难的代表性事例受到注目。在这一过程中，19世纪暂时呈现出良好局面的李舜臣，到20世纪初再次迎来高潮，相关著作连续出版。^③

(1) 李舜臣传记的连续出版——拯救国难的‘民族英雄’

以申采浩1908年5月2日到8月18日在「大韩每日新报」连载『朝鲜第一伟人：李舜臣传』为肇始，日帝强占期间强调李舜臣是挽救国难的‘民族英雄’的传记接连出版。一共在19张60页分量的文章中把李舜臣称之为‘上天为我们国家推出的圣贤，更是有将其神化为‘圣雄’的倾向。而且把李舜臣与英国的尼尔逊舰队司令相比较，在党争的漩涡中无法得到国家的支持和协助的情况下挽救国难，在这一点上的评价比尼尔逊更加杰出。与此同时，还高度评价龟船为铁甲船的元祖。

1915年朴殷植也在中国上海出版『李舜臣传』，出现了‘古今中外水军第一伟人，世界铁甲船的发明始祖’的副标题，强调李舜臣的伟大和龟船的独创性，并与尼尔逊相比较，强调李舜臣是比他更出色的人物，这些同时与申采浩的著作增添了其英雄气息。^④无论怎么说20世纪初代表韩国的两个学者介绍了挽救国家的李舜臣，强调民族存在感，这些历史意识在20世纪始终

「임진왜란의 기억과 민족의식 형성-『임진록』 등 민간전승에 나타난 민중의 민족의식」, 『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휴머니스트, 2007에서 『임진록』 판본의 수가 40여 개라고 추정하고 있다.

① 존 B. 던컨, 앞의 글, 154-163쪽 참조. 던컨은 『임진록』의 19세기 중엽 판본인 『흑룡록(黑龍錄)』의 분석을 통하여, “『임진록』에 의해 전해진(또는 조작되기도 하였을) 역사적 기억들은 당시 비양반층 사이에서 자신들이 이웃 나라들과 구별되는 사회적는도-1 집단공동체의 일원임을 자각하고 있었음을 잘 보여준다”고 밝히고 있다.

② 최원식, 「임진왜란을 다시 생각한다-『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을 읽고」, 『제국 이후의 동아시아』, 창비, 2009;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망각된 저술가 현병주의 새로운 시각으로 쓴 임진왜란사』(바오, 2016)에 재수록.

③ 이민웅, 『이순신 평전』, 책문, 2012, 426-430쪽.

④ 이민웅, 위의 책, 426-428쪽.

给后世学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世纪中期之后，李舜臣的英雄化，更是达到了神话程度，其背景不可能无视这两个学者的影响。

1924年出版了『李舜臣傳』，张道斌高度称赞李舜臣既是‘非凡的爱国主义者’，又是‘正义人道家’。接着1925年出版了包括『李舜臣傳』在内的12人的简略传记『朝鮮之偉人』(开辟社)和崔瓚植的『古代小说忠武功李舜臣实记』(博文书馆)。1931年李允宰以一年前在「东亚日报」连载过的文章为基础，出版了『聖雄李舜臣』(汉城图书股份有限公司)。该书不仅专用韩文，而且字体优美，比当时出版的任何一个李舜臣传记拥有较好的体系，还有郑仁寅的序文。在他们的书上期待着出现困难时期与李舜臣一起堪称为圣雄的人物，而且通过告诉人们这种人物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希望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心。^①

紧接李允宰，李光洙也发表了长篇小说形式的其他李舜臣传记。把1931年6月26日到1932年4月3日在《东亚日报》连载178次的汇编到一起，并在1932年出版了以『李舜臣』为题目的书。李光洙的小说『李舜臣』在光复后的1948年永昌书馆重新出版以来，接连在1968年、1971年、1995年、接着2004年也出版。李光洙与现有历史学家强调制造龟船和挽救国难的英雄不同，侧重于更好地表达李舜臣的自我牺牲性的‘忠义(爱国心)’。但是除了李舜臣和柳成龙以外的朝鲜百姓和臣僚，被描述为有空就逃避的懒惰无耻的存在，或一直执念于私利私欲的无能不道德的存在。无法找到论述对包括侵略者丰臣秀吉在内的日本方面的问题的内容。在朝鲜王朝无限的腐败和无能的层面上找到战争发生最大原因的李光洙的这一视角是与1920年代他自己通过「东亚日报」发表的‘民族改造论’的理论一脉相承。^②

(2) 被遗忘的著者——玄丙周的『秀吉一代和壬辰錄』

日帝统治时期壬辰倭乱史的研究主要由池内宏等日本的官学家主导，国内学者的研究几乎没有成果。除了教育图书的崔南善的著作『壬辰乱』(1931)之外，正式的没有一篇论文。^③崔南善的书作为简略概述壬辰倭乱的传统认识的论述，称“虽然壬辰之役是对朝鲜腐败净化的命运，对沉滞的朝鲜的奋起的时期，但是朝鲜及朝鲜人是这一历史使命的失败者”等以退行的历史认识为基础。^④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刚发掘的玄丙周的『秀吉一代和壬辰錄』(新旧书林，1928)是20世纪整体探讨壬辰倭乱的著作中最具有趣味的书。^⑤『秀吉一代和壬辰錄』分上下两册，共有200多页(上册88页，下册134页)。1928年第一次出版后，截止到1935年共刊行了5版，可以看出在当时有一定的人气。玄丙周在上册中从秀吉出生到战国时代进行了评判之后，按时间顺序叙述了出兵朝鲜时的状况。最重要的是在叙述壬辰倭乱的下册不仅描述了朝鲜的立场，而且参考了韩中日三国的资料，特点是叙述比较客观。

^① 정두희, 앞의 논문, 213-214쪽.

^② 정두희, 위의 논문, 214-218쪽 및 이민웅, 앞의 책, 429-430쪽 참조.

^③ 조원래, 「임진왜란사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 『새로운 觀點의 임진왜란사 研究』. 아세아문화사, 2005, 13-15쪽

^④ 노영구, 「임진왜란의 학설사적 검토」, 『동아시아 세계와 임진왜란』, 2010, 4쪽.

^⑤ 현병주(1880-1938)는 일제강점기인 1910-1930년대 저술활동에 매진하여 45권의 방대한 저서를 남긴 인물이다. 현병주는 1920년대 말부터 역사소설과 전쟁실기 저술에 집중하였으며, 임진왜란을 다룬 책으로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을 비롯하여 『임진명장 이여송 실기(壬辰名將李如松實記)』(1929), 『순정비화 홍도(純情秘話紅桃)의 일생(一生)』 등을 남겼다. 회계학계에 이어 국문학계에서 그의 저작들에 대하여 관심을 갖고 연구가 진행되었으며, 2016년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바오)이 ‘망각된 저술가 현병주의 새로운 시각으로 쓴 임진왜란사’란 부제와 함께 다시 출간되었다.

在书的前面表明了上下册的参考文献，诸如『宣祖实录』和柳成龙的『懲毖錄』，『李忠武功传书』等韩国方面的记录10多种；天荊的『西征日記』和是琢的『朝鮮日記』，川口長孺的『征韓偉略』，池内宏的『文祿慶長の役』等日本资料10多种；『明史』和『神宗實錄』，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諸葛元聲的『兩朝平壤錄』等中国方面的记录6种，收集了很多资料。而且，玄丙周在「著者の辯言」说到的“最侧重于事实的言语，不记录谎话”，诚如斯言，该书的特征是维持资料的严格性。

『秀吉一代和壬辰錄』反映了朝鲜后期民族性、民众性的观点，没有参考虚构性强的小说『壬辰錄』。其判断对朝鲜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壬辰錄』作为资料毫无价值，可以看出尝试摆脱一直以朝鲜一国的立场叙述壬辰倭乱历史的著者意图，故排除了『壬辰錄』。^①实际上从本文著者写的注释可以看出，试图不是以一国视角看壬辰倭乱，而是试图用三国的视角看壬辰倭乱。玄丙朱在书上需要叙述对同一事件三国的不同观点的部分中加了注释。^②而且对包括李舜臣在内的任何一个将军或者忠臣没有加以英雄化。在书的最后‘总评’之中指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对朝鲜、明朝和日本都造成了损害，但是没有只追究他的罪责，其理由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脉络中得以理解。

“如果说，在崇拜英雄的时代是时代创造英雄，那么即使可以把当时的责任推卸到丰臣秀吉一个人身上，但如果科学地理解历史的话，是时代创造了英雄，因此对于丰臣的失误，时代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③

主张放弃英雄史观而用‘科学’角度看待历史的玄丙周的意见，不是没有争论余地，我认为，把壬辰倭乱看作是由丰臣秀吉的个人欲望而引起，倒不如从整体大局的角度来看壬辰倭乱。^④

3. 大韩民国对壬辰倭乱的认识

在韩国对壬辰倭乱进行全面学术性研究是从 1945年之后开始的。19世纪后期开始的日本对壬辰倭乱的研究与正式侵略大陆的起点相对应，凸显了政治军事性目的，同样在韩国对壬辰倭乱的研究也受到了激剧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其特点是，既批判又关注日本的现有的研究而进行的研究。^⑤

(1) 克服国难史观的开始和壬辰倭乱(解放-1950年代)

1945年的解放和建国大韩民国以来史学界面临的课题是摆脱日帝殖民史学。当然刚解放后，由于政治混乱，未能开展对壬辰倭乱的正式研究。1946年出版的李允宰『圣雄李舜臣』、李殷相的『李忠武功生平传记』和1952年李無影的『李舜臣』等，出版了几部关于李舜臣的传记。1950

① 장연연(張燕燕), 「대중계몽주의자 현병주-그의 생애와 계몽담론,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에 대하여,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 바오, 2016, 307-308쪽.

② 장연연, 위의 글, 308-309쪽.

③ 현병주,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망각된 저술가 현병주의 새로운 시각으로 쓴 임진왜란사』, 바오, 2016, 282-283쪽.

④ 장연연, 위의 글, 312-313쪽; 최원식, 앞의 글, 325-327쪽.

⑤ 광복 후 국내에서 이뤄진 임진왜란 관련 연구사를 정리한 주요 성과는 다음과 같다. 이장희, 「왜란과 호란」, 『한국사연구입문(2판)』, 지식산업사, 1987; 오종록, 「임진왜란-병자호란시기 군사사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 『군사』 38, 1999; 조원래, 「임진왜란사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 『새로운 관점의 임진왜란사 연구』, 2005; 박제광, 「임진왜란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 『임진왜란과 한일관계』, 경인문화사, 2005; 노영구, 「임진왜란의 학설사적 검토」, 『동아시아 세계와 임진왜란』, 2010; 김강식, 「임진왜란을 바라보는 한국과 일본의 시각」, 『지역과 역사』 38, 2016; 김경록, 「임진왜란 연구의 회고와 제안」, 『군사』 100, 2016 등.

年出刊了震檀学会共同编写的『李忠武公』，重新凸显在国家级危机中克服国难的英雄李舜臣的历史地位。^①这一时期特别是以李殷相等人为中心在釜山庆南镇海、巨济、统营、全南珍岛等地建立了忠武公铜像和纪念碑。

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孙晋泰在1949年汇编的『國史大要』中不是称之为壬辰倭乱，而是称为‘与日本的七年战争’，在‘人民軍的崛起’条目中对义兵进行了详细记述，并强调了倭乱7年所具有的重要性。

不过，1950年“六二五”朝鲜战争时因为孙晋泰和이인영（李仁荣？）等多数民族主义历史去了北朝鲜，所以他们的历史认识未能得到继承和发展。

朝鲜战争以后，1950年代中期凸显的是‘克服国难史观’。如果根据这个史观，‘国难史是国史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在这期间经历的内部和外部的国难的记录。’特记了韩国民族虽然经历了许多国难，但是一次也没有屈服于外部势力。^②但是到1950年代在韩国史领域里对壬辰倭乱专门性的研究还是很少，通史性叙述壬辰倭乱为大多数。

(2) 民族主义潮流中克服国难史观的盛行和壬辰倭乱研究（1960-1970年代）

1960年“四·一九革命”和1961年“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韩国史随着学界对日帝的殖民体制和殖民史观全面性批判，出现了强调韩国史的构造性发展和民族优越性的潮流。^③与现有李舜臣的研究一起，义兵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也是1960年代的研究特征。特别是최영희（崔荣喜？）通过在战乱中不屈于他民族的广大民众参与抗战时的义兵的事例，全面地探讨了义兵蜂起的社会背景和义兵将的性质、义兵的变迁等。^④规定义兵为‘民族性抵抗文学’的他，在壬辰倭乱时期把乡土防御意识和韩国民族对日本民族的看法作为义兵思想上的基础，1950年代部分出现了克服国难史观的意识，但是因反映当时时代情况义兵在民族主义的层次上得到了新的认识。

최영희（崔荣喜？）的研究成为之后이재호·김윤곤·이장희·최근목·송정현^⑤等人对义兵的多样性研究和对各地区主要义兵研究的起点。

这一时期集中形成的义兵研究，支持了壬辰倭乱是日本单方面胜利的观点的同时，通过与降倭相比较，从精神史侧面甚至论证了我们有着坚强意志的观点。^⑥在这个依据上形成了‘与李舜臣、明军一起，义兵消弭了壬辰倭乱’的以义兵为中心的认识。也就是，义兵代替‘无气力’的朝鲜官军，义兵在陆上战斗中以游击战术给日军打击了不少，这种认识。^⑦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成果有이형석의『壬辰戰亂史』（上下）。^⑧其收集、引用国内外的大量文献资料，页数更是达到1900页。此书是以战争史为中心综合整理壬辰倭乱的

① 이민웅, 앞의 책, 431-432쪽.

② 김종권, 「서문(序文)」, 『국난사개관(國難史概觀)』, 명문당, 1956. 1쪽.

③ 노영구, 앞의 글, 8-9쪽.

④ 최영희, 「임란의병의 성격」, 『史學研究』 8, 1960.

⑤ 김윤곤 「곽재우의 의병활동-특히 조직과 戰術·戰略을 중심으로」, 『역사학보』 33, 1967; 이재호, 「임란 의병의 일고찰-특히 관군과 명군과의 관계를 중심으로」, 『역사학보』 35-36, 1967; 이장희, 「임란 해서 의병에 대한 일고찰-연안대첩을 중심으로」, 『사총』 14, 1969; 최근목, 「임란때의 湖西의병에 대하여」, 『논문집』 9(충남대), 1970; 송정현, 「임진왜란과 호남의병」, 『역사학연구』 4, 1972.

⑥ 이장희, 「왜란과 호란」, 『한국사연구입문』(2판), 지식산업사, 1987, 320쪽.

⑦ 한우근, 『국사』, 을유문화사, 1968, 156-157쪽.

⑧ 이형석, 『壬辰戰亂史』 상 『, 임진전란사간행위원회, 1967년. 이 책은 1974년 다시 전3권(상시974)으로 증보개정판이 발간되었다.

著作。

1970年代許善道为了摆脱把义兵活动理解为单纯的乡村地区士族和农民汇合的民族抗争的观点，指出义兵活动逐渐受到国家的调整和统制。^①与明朝军队派兵关联的讨论，也在1970年代开始形成。

유구성整理了明朝军队的派兵过程和明朝军队祸害百姓的问题，^②明清研究者최소자主张由于明军派兵与朝鲜邀请，战争扩展散到明朝本土，为的是防备北京一带受到威胁。^③由此可知，壬辰倭乱的性质不能单纯从民族史性质的视角看作日本侵略朝鲜和朝鲜应战，应视为包括明朝在内的东亚国家参与的国际战争。^④

然而，不顾这种研究的进展，以1970年维新政权为代表的情况，只能是对壬辰倭乱理解和研究的歪曲。维新政权强调树立‘有国籍的教育’和‘有主体的民族史观’，从国家层次推进国史教育的强化，遗迹的复原和整顿，强调和教育立足国家主义的忠孝思想等。而且，以北朝鲜攻势性的对韩政策和1975年南越南败亡等剧变的国内外形势为契机，克服国难史观^⑤再次盛行。以韩民族克服国难史的观点看对异民族的抵抗，并以一直以来的战争史初期会失败到最后民族团结对抗战争的方式叙述，可以看出国难克服史观对壬辰倭乱的认识。像这样的克服国难史的认识，在1979年维新政权垮台之后也未能完全消失。之后通过壬辰倭乱的研究和国史、国民伦理等所谓的国定科目作为一般认识扎下了根。^⑥

更重要的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朴正熙总统主导下国家对李舜臣进行了赞颂活动。除了既是始祖诗人又是小说家的李殷相以外、최영희、조성도等历史学家们也参与了该项活动，在英雄化李舜臣的项目中做出了一定贡献。由国家主导在显忠祠和闲山岛·制胜堂等展开了有关李舜臣遗迹的圣域化事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建立了世宗大王和忠武公的铜像。然而，对李舜臣的过度美化、英雄化之后，反而成为研究壬辰倭乱和李舜臣障碍。^⑦

(3) 民主化和新的壬辰倭乱认识的开始(1980-1990年代)

维新体制崩溃后的1987年6月，民主抗争逐渐树立了民主主义，认识到民众是变革的主体，提出把民众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的民众史学论，并在壬辰倭乱的研究上也出现了新的倾向。1980年李泰晋对持有壬辰倭乱以败而结束的认识提起问题，找出了原因。他指出，在16世纪由于弊政引起了朝鲜初期军事制度的崩溃，这是朝鲜官军初期失败的原因。与此同时，在这期间追溯了在壬辰倭乱研究上未受瞩目的对朝鲜和日本的战术和武器体系的认识。^⑧1985年许善道志主张以现有研究当中出现的‘殉國史觀’或‘英雄史觀’，从战争史的角度通过对军制、军需、武器、战术、官方、情报等领域的客观性的研究，重新认识壬辰倭乱。^⑨但是，对壬辰倭乱的认识没有全面变化，^⑩1980年代在义兵研究上，也没有完全摆脱1970年代克服国难史的历史认识。

① 허선도, 「鶴峰先生과 임진의병활동」, 『國譯 鶴峰全集』(국역학봉전집편찬위원회), 1976.

② 유구성, 「壬亂時 明兵의 來援考-朝鮮의 被害를 中心으로」, 『사충』 20, 1976.

③ 최소자, 「임진란시 명의 파병에 대한 논고」, 『동양사학연구』 11, 1977.

④ 노영구, 앞의 글, 13-14쪽.

⑤ 이선근, 『한민족의 국난극복사』, 휘문출판사, 1978; 이재호, 「『한민족의 국난극복사』 서평」, 『역사와 세계』 3, 효원사학회, 1979.

⑥ 노영구, 앞의 글, 15쪽.

⑦ 이민웅, 앞의 책, 432-434쪽.

⑧ 이태진, 「임진왜란에 대한 이해의 몇가지 문제」, 『군사』 창간호, 1980.

⑨ 허선도, 「임진왜란론-올바르고 새로운 인식」, 『천관우선생 환력기념 한국사학논총』, 1985.

⑩ 노영구, 앞의 글, 18쪽.

随着1991年地区议会组建和1995年自治团体首长选举等地方自治体制的复活，对地方史的关注也达到高潮。^①这对壬辰倭乱研究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对地区义兵部队活动进行了研究。脱离研究著名的义兵长，试图利用小规模乡村史料对小规模义兵部队及义兵长进行微观分析，通过这种分析，阐明义兵有义兵和乡兵两种形态。而且，揭示了乡村社会研究的一个环节，认为壬辰倭乱时期地方土族的乡村支配体制是招募义兵和进行活动的主要基础。^②

以壬辰倭乱爆发400周年的1992年为起点，一般人对壬辰倭乱的关注也得到了提高，研究领域也多样化了。国史汇编委员会『韩国史论』22号（1992）在‘壬辰倭乱的再认识’特辑上，讨论了现有的义兵之外的官军活动、明军参战、受害者、壬辰倭乱前朝鲜国防实况、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等多个侧面。进入1990年代后，包括壬辰倭乱当时的日记、乡村和门中资料开始被广泛地利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阐明了义兵的主力不是单纯的农民，而是脱离官军的‘逋将’或者落伍军兵‘散卒’。^③与此同时，揭示了义兵的军粮和武器等得到了官方的积极支援，这可以看出义兵和官军的不可分离性。

此后在义兵研究上也开辟了战争史的视角，试图摆脱克服国难史观的视角。^④在相关研究中，壬辰倭乱当时的战争体验和记录个人生活的手记资料开始得到利用，随着北岛万次等专门研究壬辰倭乱的日本研究者介绍研究成果后，对日本资料的关注也开始达到高潮。虽然一直进行了对门中或者以人物为中心的壬辰倭乱研究，也出现了从壬辰倭乱战争史角度研究朝鲜军的火药、兵器、^⑤朝鲜军的战略战术、^⑥筑城^⑦等。特别是对因水军和义兵研究而被忽视的官军和明军进行了真正的研究，克服了以义兵和水军为中心的壬辰倭乱的认识局限，开始关注战争的多样性。^⑧特别是韩明基，他分析了明朝军队的参战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影响，^⑨这对壬辰倭乱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对官军和明军的研究，以此为契机，摆脱了直到1980年代研究里常常出现的“（壬辰倭乱当时）作为正规军的官军几乎不存在”的否定看法，在这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⑩

(4) 以东亚的观点摸索壬辰倭乱的认识 (2000年代后)

^① 조원래, 「임란 해전과 흥양수군」, 『남도문화연구』 2, 1986; 나중우, 「임란의병과 장성남문 창의」, 『향토문화연구』 4, 1987; 조원래, 「나주지방 사례로 본 임란의병 연구과제」, 『나주목의 재조명』(목포대 박물관), 1989; 김석희, 「임진왜란과 청도지역의 창의활동」, 『부산사학』 23, 1992 등 다수.

^② 정진영, 「임란전후 尙州지방 사족의 동향」, 『민족문화논총』 8, 1987; 고석규, 「정인홍의 의병활동과 山林기반」, 『한국학보』 51, 1988.

^③ 이수건, 「月谷 禹拜善의 壬辰倭亂 義兵活動; 그의 『倡義遺錄』을 중심으로」, 『민족문화논총』 13, 1992.

^④ 노영구, 앞의 글, 22쪽.

^⑤ 박제광, 「임진왜란기 조선군의 화약병기에 대한 일고찰」, 『군사』 30, 1995.

^⑥ 이장희, 「왜군격퇴의 戰略·戰術」, 『한국사』 29, 1995; 노영구, 「선조대 紀效新書의 보급과 陣法 논의」, 『군사』 34, 1997; 강성문, 「행주대첩에서의 권율의 전략과 전술」, 『임진왜란과 권율』, 전쟁기념관, 1999.

^⑦ 이장희, 「壬亂中 山城修築과 堅壁淸野에 대하여」, 『阜村申延澈教授停年退任紀念 史學論叢』, 1995.

^⑧ 조원래, 「명군의 출병과 임란전국의 추이」, 『한국사론』 22, 1992; 장학근, 「임진왜란기 관군의 활약」, 『한국사론』 22, 1992; 한명기, 「임진왜란 시기 명군 참전의 사회 문화적 영향」, 『군사』 35, 1997; 박제광, 「임란 초기전투에서의 官軍의 활동과 권율」, 『임진왜란과 권율』, 전쟁기념관, 1999.

^⑨ 한명기, 『임진왜란과 한중관계』, 역사비평사, 1999.

^⑩ 노영구, 앞의 글, 24 쪽.

1980年代提出的以战争史视角审视壬辰倭乱的研究在2000年之后变成了主流倾向。2004年出版的『军史』51号的“壬辰倭乱的再探讨”特辑中，收录了壬辰倭乱时朝明联军的骑兵作战，通过龟船、海战比较了朝明日三国的战略战术，记录了武器体系、短兵器、晋州城战役等，这些多方面的战争史主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同时，随着1990年代后期全球化的进展，出现了摆脱现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即所谓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紧随其后，立足于民主主义史观而对现有韩国史的认识提出了真正的批判，出现了认为壬辰倭乱也是韩中日三国参战的东亚国际战争的观点和研究。2006年6月在庆南统营召开了“壬辰倭乱：从朝日战争到东亚三国战争”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时发表的论文于2007年结集出版，是为代表性成果。^①与此同时，15世纪后期因大航海时代的余波，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势力波及东亚，出现了以白银为媒介联系欧洲和中国的流动性国际秩序，有学者以此来研究壬辰倭乱。^②2000年代两次韩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加深了人们对壬辰倭乱的认识。^③

并且有研究尝试对认为由于朝鲜军无力对应而导致失败的壬辰倭乱初期状态进行根本性批判。노영구摆脱把朝鲜军初期战败归因于朝鲜军事动员体制问题和未建立军事力量的想法，认为朝鲜军初期进行了应对，动员体制也适当运作，但因战术脆弱性，导致无法避免战败。^④而且脱离在这之前认为义兵的组织是在士林主导下居民和贱民等下层民众参与的组织的视角，主张义兵的组织以落伍官军即“散卒”为主力，他们具有准官军的属性，他们的活动是以朝鲜前期地方军事体制的鎭管體制为基础。^⑤与此同时追溯义兵性质的再讨论研究，对现有壬辰倭乱有关资料进行了批判性考察。^⑥

在这期间发表了有关倭城和讲和交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⑦2012年以壬辰倭乱7周年(420年)为契机，以社团法人壬辰乱精神文化宣扬会为中心，对地区义兵将进行了持续研究。但是因得到地方自治团体的后援，迄今为止在地区义兵将和李舜臣的研究中仍然可以看出克服国难史观的认识，这便是21世纪韩国研究壬辰倭乱的现状。^⑧

① 정두희·이경순 엮음, 『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휴머니스트, 2007.

② 한명기, 「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 질서」, 『임진왜란과 한일관계』, 경인문화사, 2005; 강응천·한명기 외, 「동아시아 7년 전쟁」, 『16세기-성리학 유토피아』(‘민음 한국사’ 조선 02), 2014.

③ 제 1 기 한일역사공동위원회(2002. 5.~2005. 3.)와 제 2 기 한일역사공동위원회(2007. 6.~2009. 11.)는 2005 년과 2010 년 각각 6 권과 7 권의 공동연구보고서를 펴냈다. 이와 함께 제 1·2 기 한일역사공동위원회 한국 측 위원회는 공동주제에 대한 심화연구 결과물을 묶어 『한일관계사연구논집』(경인문화사)을 발간하였다. 2005년과 2010년 각 10권씩 모두 20권이 나왔다.

④ 노영구, 「壬辰倭亂 초기 양상에 대한 기존 인식의 재검토-和歌山縣立博物館 소장 장壬辰倭亂圖屏風에 대한 새로운 이해를 바탕으로」, 『한국문화』 31, 2003.

⑤ 노영구, 「임진왜란 초기 경상우도 의병의 성립과 활동 영역-金沔 의병부대를 중심으로」, 『역사와 현실』 64, 2007.

⑥ 정두희·이경순 엮음, 앞의 책, 2007; 정지영, 「‘임진왜란’과 ‘기생’의 기억-한국전쟁 이후의 ‘논개’에 대한 상상과 전유」; 요네타니 히토시, 「사로잡힌 조선인들-전후 조선인 포로 송환에 대하여」; 하영휘, 「하왕산성의 기억-신화가 된 의병사의 재조명」; 존 B. 던컨, 「임진왜란의 기억과 민족의식 형성-『임진록』 등 민간전승에 나타난 민중의 민족의식」; 정두희, 「이순신에 대한 기억의 역사와 역사화-4백 년간 이어진 이순신 담론의 계보학」 등.

⑦ 나동욱, 「부산왜성에 대한 고찰」, 『博物館研究論集』 19, 2013; 김경태, 『임진전쟁기 강화교섭 연구』, 고려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14.

⑧ 사단법인 임진란정신문화선양회는 2010년 제정한 정관에서 “본회는 국가의 정통성과 정체성을 크게 위협당한 임진란의 위기 상황에서 국난을 극복하는데 지도적 역할을 하였던 인물 등의 업적을 역사적으로 재조명하여 위업을 추모하며 …”라고 설립 목적을 밝히고 있다.

4. 结语

从朝鲜时代到现在以韩国对壬辰倭乱的研究史和认识为基础,我想提出以下几点问题和课题来作为本文结语。

第一,随着壬辰倭乱研究成果的积累,提出了多个侧面和视角。但是就像壬辰倭乱名称没有变化被沿用一样,出于政治目的把壬辰倭乱作为克服国难史的主题的倾向还没有消除。这与在军事政权时期壬辰倭乱成为克服国难史的主要主题密切相关。而且,由于义兵将的子孙们到现在还在地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较多,所以为了彰显祖先业绩而故意隐瞒实况的也有不少。当然不是说在壬辰倭乱上找出克服国难的教训是错的,但是从朝鲜后期到现在,韩国一直存在为政者们为了政治目的故意强调或利用克服国难,更重要的是克服国难史不亚于殖民地史,歪曲历史事实,强化特定的历史印象,可以说这方面存在问题。

第二,壬辰倭乱中朝鲜赢得胜利的视角。壬辰倭乱当时朝鲜只在战争初期失败,平壤战斗之后朝鲜在大部分战役取得了胜利。从战争史的角度看,日本没有贯彻发动战争的政治性目的,丰臣秀吉的愿望受挫。在强调胜利的时候,忽视了朝鲜是战场这一事实。壬辰倭乱结束之后恢复农耕的损害时间就花费了一个世纪,这说明我们社会的发展被战争延误了很久时间。总而言之,把壬辰倭乱视为胜战是扭曲事实,是政府给自己的借口,只不过是政府放弃保护国民任务而给开出免罪符而已。壬辰倭乱虽是朝鲜王朝建国 200 年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但是度过这个危机的结果是确立了两班士大夫的统治。^①

第三,壬辰倭乱是强化事大主义的战争。事实上明军参战的目的主要不是帮助朝鲜,而是想把朝鲜变成战场,觉得比起平原地带的辽东,更好的选择是群山连绵的朝鲜。战争中明朝不仅行暴,战争之后还干预朝鲜内政。但是,朝鲜统治阶层还是把明朝视为‘再造国家的恩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因壬辰倭乱朝鲜王和两班的权威都遭受重大打击,但是他们强烈适用性理学的名分,加强了原有统治体制。因对明朝强调事大,经过两次胡乱,百姓们惨遭两次胡乱灾祸,但是朝鲜王朝的统治却因此得到了强化。

联系引发壬辰倭乱的背景,韩国进入 1960 年代开始从日本内部找出战争的原因。在最近的韩国史教科书上也写道,16 世纪末丰臣秀吉平定战国时代的混乱,统一日本之后,为了转移国内不满势力的注意力,为了实现侵略大陆的野心而侵略了朝鲜。^②1980 年代提出了由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利害关系引起了战争,1990 年代提出了在西洋文明的刺激下侵略了中国,挑战了国际秩序的见解。2000 年代提出了从东亚三国的国际性和大局重新认识壬辰倭乱的主张。^③

然而,摆脱一个国家的视角而以东亚视角看壬辰倭乱的尝试,从日帝强占时期玄丙周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各界不断主张该论调,但是没有实际成果。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一个案例,即客观使用韩中日东亚三个国家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的研究。在韩国,中日资料不用说,就连各地方的史料和各种古文书也还没有充分利用。这跟韩国连一本壬辰倭乱的通史都没有的情况有关。^④这样的现实表明,韩国在构筑壬辰倭乱研究方面没有成功构筑普遍性的历史镜像。反过来说,通过切实加强对一国史的审视,以进一步确立新的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全像。^⑤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基础作业,需要

^①오종록, 위의 글, 87~88 쪽.

^②80 주진오 외, 『고등학교 한국사』(5 판), 천재교육, 2018, 130 쪽.

^③주진오 외, 『고등학교 한국사』(5 판), 천재교육, 2018, 130 쪽.

^④강응천·응천기 외, 앞의 책, 2014.

^⑤노영구, 앞의 글, 28~30 쪽.

东亚三国共同整理史料。希望韩中日东亚三国把重要资料集中在一起，开展详细译著的基础作业，以比较史的认识，以东亚的视角，能够客观地审视壬辰倭乱。^①

主要参考文献

[]内的中文是韩国语《书名》和<论文名>的翻译。

著作

- 이형석, 『壬辰戰亂史』 상·하, 임진전란사간행위원회, 1967(이형석, 『壬辰戰亂史』 상·중·하, 신현실사, 1974 등으로 증보개정).
- 한국사연구회, 『한국사연구입문』(2판), [《韩国史研究入门》(2版)] 지식산업사, 1987.
- 한명기, 『임진왜란과 한중관계』[《壬辰战乱和韩中关系》], 역사비평사, 1999.
- 이장희, 『壬辰倭亂史研究』, 아세아문화사, 1999(이장희, 『개정·증보 임진왜란사연구』, 아세아문화사, 2007로 개정·증보).
- 이민용, 『임진왜란 해전사』[《壬辰倭乱海战史》], 청어람미어, 2004.
- 한일관계사연구논집 편찬위원회, 『임진왜란과 한일관계』[《壬辰倭乱和韩日关系》], 경인문화사, 2005.
- 조원래, 『새로운 觀點의 임진왜란사 研究』[《新观点的壬辰倭乱史研究》]. 아세아문화사, 2005.
- 정두희·이경순 엮음, 『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壬辰倭乱和东亚三国战争》], 휴머니스트, 2007.
- 한일관계사연구논집 편찬위원회, 『동아시아 세계와 임진왜란』[《東亞世界与壬辰倭乱》], 경인문화사, 2010.
- 한일문화교류기금, 『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세계의 변동』[《壬辰倭乱和东亚世界的变动》], 경인문화사, 2010.
- 이민용, 『이순신 평전』[《李舜臣评传》] 책문, 2012.
- 강웅천·한명기 외, 『16세기-성리학 유토피아』[《16世纪--性理学乌托邦》](민음 한국사'국조선02), 2014.
- 김경태, 『임진전쟁기 강화교섭 연구』[《壬辰倭乱期讲和交涉研究》], 고려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14.
- 현병주,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망각된 저술가 현병주의 새로운 시각으로 쓴 임진왜란사』, [《秀吉一代和壬辰录--被遗忘的著者 玄丙周的新视角看壬辰倭乱史》]바오, 2016.
- 주진오 외, 『고등학교 한국사』(5판), [《高等学校 韩国史》(5版)] 천재교육, 2018.

论文

- 최영희, 「임란의병의 성격」, 『史學研究』8, [《壬辰倭亂的性质》《史学研究》8] 1960.
- 김윤곤 「곽재우의 의병활동-특히 조직과 戰術·戰略을 중심으로」, 『역사학보』33, [《郭再祐的义兵活动--特别是以组织和战術·战略为中心》《历史学报》33] 1967.
- 이재호, 「임란 의병의 일고찰-특히 관군과 명군과의 관계를 중심으로」, 『역사학보』35.36, [《壬辰义兵的工作考察--特别是以官军和明军的关系为中心》《历史学报》35、36] 1967.

^① 정구복, 앞의 글, 21 쪽; 노영구, 위의 글, 30 쪽.

- 이장희, 「임란 해서 의병에 대한 일고찰-연안대첩을 중심으로」 『사총』 14, [〈壬乱期对义兵的工作考察——以延安大捷为中心〉《史叢》14] 1969.
- 최근목, 「임란때의 湖西의병에 대하여」, 『논문집』 9 [〈关于壬辰时期的湖西义兵〉《论文集》9] (충남대), 1970
- 송정현, 「임진왜란과 호남의병」, 『역사학연구』 4, [〈壬辰倭亂和湖南义兵〉《历史学研究》4] 1972.
- 허선도, 「鶴峰先生과 임진의병활동」 [〈鶴峰先生和壬辰义兵活动〉], 『國譯 鶴峰全集』 (국역학봉전집편찬위원회), 1976.
- 유구성, 「壬亂時 明兵의 來援考-朝鮮의 被害를 中心으로」 『사총』 20, [〈探讨壬亂時明兵的派兵援助——以朝鮮的受害为中心〉《史叢》20], 1976.
- 최소자, 「임진란시 명의 파병에 대한 논고」, 『동양사학연구』 11, [〈壬辰倭亂时对明朝的派兵的论文〉《东洋史学研究》11] 1977.
- 이태진, 「임진왜란에 대한 이해의 몇가지 문제」 『군사』 창간호, [〈对壬辰倭亂理解的几个问题〉《军史》创刊号], 1980.
- 허선도, 「임진왜란론-올바르고 새로운 인식」 [〈壬辰倭亂论-正确的新认识〉], 『천관우선생 환력기념 한국사학논총』, 1985.
- 조원래, 「임란 해전과 흥양수군」 『남도문화연구』 2, [〈壬辰海战和兴阳水军〉《南道文化研究》2], 1986.
- 나중우, 「임란의병과 장성남문 창의」 『향토문화연구』 4, [〈壬辰义兵和长城南门倡议〉《乡土文化研究》4], 1987.
- 정진영, 「임란전후 尙州지방 사족의 동향」 『민족문화논총』 8, [〈壬辰战后尙州地区士族的动静〉《民族文化論叢》8], 1987.
- 고석규, 「정인홍의 의병활동과 山林기반」 『한국학보』 51, [〈郑仁弘的义兵活动和山林基础〉《韓國學報》51], 1988.
- 조원래, 「나주지방 사례로 본 임란의병 연구과제」 『나주목의 재조명』 (목포대 박물관) [〈以罗州地区事例探讨壬辰义兵研究课题〉《羅州牧的再审视》(木浦大学博物馆)], 1989.
- 이장희, 「왜란과 호란」, 『한국사연구입문(2판)』 [〈倭亂和胡亂〉《韩国史研究入门(2版)》], 지식산업사, 1987.
- 김석희, 「임진왜란과 청도지역의 창의활동」 『부산사학』 23, [〈壬辰倭亂与清道地区的倡议活动〉《釜山史学》23], 1992.
- 조원래, 「명군의 출병과 임란전국의 추이」 『한국사론』 22, [〈明军的派兵和壬辰倭亂全局的推移〉《韓國史論》22], 1992.
- 장학근, 「임진왜란기 관군의 활약」 『한국사론』 22, [〈壬辰倭亂期官军的活跃〉《韓國史論》22], 1992.
- 박제광, 「임진왜란기 조선군의 화약병기에 대한 일고찰」 『군사』 30, [〈对壬辰倭亂期朝鮮军兵器的工作考察〉《軍史》30], 1995.
- 이장희, 「왜군격퇴의 戰略·戰術」 『한국사』 29, [〈击退倭军的戰略戰術〉《韓國史》29], 1995.
- 한명기, 「임진왜란 시기 명군 참전의 사회 문화적 영향」 『군사』 35, [〈壬辰倭亂时期明军参战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軍史》35], 1997.
- 노영구, 「선조대 紀效新書의 보급과 陣法 논의」 『군사』 34 [〈宣祖代紀效新書的普及和陣法论议〉《军史》34], 1997.

- 강성문, 「행주대첩에서의 권율의 전략과 전술」『임진왜란과 권율』, [〈幸州大捷与权栗的战略战术〉《壬辰倭乱和权栗》], 전쟁기념관, 1999.
- 박재광, 「임란 초기전투에서의 官軍의 활동과 권율」『임진왜란과 권율』 [〈壬辰倭乱初期战争中的官軍的作用与权栗〉《壬辰倭乱和权栗》], 전쟁기념관, 1999.
- 오종록, 「임진왜란-병자호란시기 군사사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군사』 38, [〈壬辰倭乱到丙子胡乱时期军事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軍史》38], 1999.
- 오종록, 「여러 얼굴의 전쟁, 임진왜란」『내일을 여는 역사』 1, [〈多面孔的战争—壬辰倭乱〉《开启明天的历史》1], 2000.
- 노영구, 「壬辰倭亂 초기 양상에 대한 기존 인식의 재검토-和歌山縣立博物館 소장壬辰倭亂圖屏風’에 대한 새로운 이해를 바탕으로」『한국문화』 31, [〈对壬辰倭乱初期影响的现有认识的再探讨—以和歌山縣立博物館所长对‘壬辰倭亂圖屏風’的新的理解为基础〉《韓國文化》31], 2003.
- 오종록, 「보통 장수에서 구국의 영웅으로-조선후기 이순신에 대한 평가」, 『내일을 여는 역사』18, [〈从普通将帅到救国英雄—朝鲜后期对李舜臣的评价〉《开启明天的历史》18,], 2004.
- 조원래, 「임진왜란사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새로운 관점의 임진왜란사 연구』, [〈壬辰倭亂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壬辰倭乱研究的新的视角》], 2005.
- 박재광, 「임진왜란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임진왜란과 한일관계』, [〈壬辰倭乱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壬辰倭乱和韩日关系》], 경인문화사, 2005.
- 정진영, 「松菴 金沔의 임란 의병활동과 관련 자료의 검토」『대구사학』 78, [〈关于倭乱时期松菴金沔的义兵活动的资料考察〉《大丘史学》78], 2005.
- 한명기, 「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 질서」『임진왜란과 한일관계』, [〈壬辰倭乱和东亚秩序〉《壬辰倭乱和韩日关系》], 경인문화사, 2005.
- 정두희 「이순신에 대한 기억의 역사와 역사화-4백 년간 이어진 이순신 담론의 계보학」『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对李舜臣记忆的历史和历史化—延续四百年的谈论李舜臣的系谱学〉《壬辰倭乱 东亚三国战争》], 휴머니스트, 2007.
- 하영휘, 「화왕산성의 기억-신화가 된 의병사의 재조명」『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火旺山城的记忆—被神化的义兵史的再探讨〉《壬辰倭乱 东亚三国战争》], 휴머니스트, 2007.
- 존 B. 던킨, 「임진왜란의 기억과 민족의식 형성-『임진록』 등 민간전승에 나타난 민중의 민족의식」『임진왜란 동아시아 삼국전쟁』, [〈壬辰倭乱的记忆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壬辰录』等在民间传承当中出现的民众的民族意识〉《壬辰倭乱 东亚三国战争》], 휴머니스트, 2007.
- 노영구, 「임진왜란 초기 경상우도 의병의 성립과 활동 영역-金沔 의병부대를 중심으로」『역사와 현실』 64, [〈壬辰倭亂初期庆尚右道义兵的成立和活动领域—以金沔义兵部队为中心〉《历史与现实》64], 2007.
- 최원식, 「임진왜란을 다시 생각한다-『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을 읽고」『제국 이후의 동아시아』 [〈重新思考壬辰倭乱---读完『秀吉一代和壬辰录』之后〉《帝国以后的东亚》], 창비, 2009(『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 바오, 2016에 재수록).
- 노영구, 「임진왜란의 학설사적 검토」『동아시아 세계와 임진왜란』, [〈壬辰倭乱的学说史性研究〉《东亚世界与壬辰倭乱》], 2010.
- 손승철,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를 통해 본 임진왜란의 기억」『임진왜란과 동아시아세계의 변동』, [〈通过『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看的壬辰倭亂的记忆〉《壬辰倭乱与东亚世界的变

动》], 경인문화사 2010.

이규배, 「조선시대 적대적 對日인식에 관한 고찰-임진왜란-조선시대 말기를 중심으로」, 『군사』 84, [〈关于朝鲜时代敌对的對日认识的考察—以壬辰倭乱-朝鲜时代末期为中心〉《軍史》84] 2012.

김강식, 「조선후기의 임진왜란 기억과 의미」『지역과 역사』 31, [〈朝鲜后期对壬辰倭乱的记忆和意义〉《地域与历史》31], 2012.

이태진, 「정조대왕의 충무공 이순신 숭모(崇慕)」『충무공 이순신과 한국 해양』 제2호, [〈正祖大王对忠武公李舜臣的崇慕〉《忠武公李舜臣与韩国海洋》第2号], 해군사관학교 해양연구소, 2015.

김강식, 「임진왜란을 바라보는 한국과 일본의 시각」[〈韩国和日本看壬辰倭乱的角度〉], 『지역과 역사』 38, 2016.

김경록, 「임진왜란 연구의 회고와 제안」『군사』 100, [〈研究壬辰倭乱的回顾和提议〉《軍史》100], 2016.

정구복, 「임진왜란사 연구와 한·중·일 중요 사료」『한국사학사학보』, [〈壬辰倭乱史研究和韩·中·日重要史料〉《韩国史学史学报》], 2016.

장연연(張燕燕), 「대중계몽주의자 현병주-그의 생애와 계몽담론, 『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에 대하여」『수길일대와 임진록』, [〈大众启蒙主义者玄丙周一—他的一生和启蒙谈论, 关于《秀吉一代和壬辰录》〉《秀吉一代和壬辰录》], 바오, 2016.